

新文学史

20世纪

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朱晓进 等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206.7

Z880



20世纪

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朱晓进 等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 朱晓进等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81047-919-9/I·20

I. 非... II. 朱...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322 号

书 名	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作 者	朱晓进 等
责任编辑	高朝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nuniprs@public1.ptt.js.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7-919-9/I·20
定 价	55.00 元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 朱晓进

- 导 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 2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角度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2
- 第二节 作为研究方法的政治文化视角 4
-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 7
- 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11



□ 杨洪承

- 第一章 五四文学与政治文化 14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载体的新文学的源流 14
- 第二节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 22
- 第三节 20年代文学社群聚散的政治文化意向 33
- 第四节 20年代的文学接受与政治文化心理 47
- 第五节 20年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与政治文化理念 55

QAP97/3



朱晓进

- 第二章 3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70
- 第一节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与文学氛围 71
- 第二节 30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 85
- 第三节 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色彩 110
- 第四节 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对30年代文学的导向 126
- 第五节 政治文化与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146



贺仲明

- 第三章 40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168
- 第一节 40年代政治文化背景与文学概况 168
- 第二节 战争规范与制约下的40年代文学论争 183
- 第三节 非文学化的文学组织与社团 195
- 第四节 40年代作家的政治文化心态和文学道路选择 208
- 第五节 政治文化与40年代文学主题的嬗变 225
- 第六节 政治文化与40年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诗歌意象 237
- 第七节 政治文化与40年代文学体裁形式的变迁 249



□王 洁

- 第四章 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262
- 第一节 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建国后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化 262
- 第二节 17年的文学思潮与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化 279
- 第三节 新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自我改造 295
- 第四节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革命 315
- 第五节 政治化要求下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 333



□何言宏

- 第五章 新时期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358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语境的重造 358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论争与政治文化 369
- 第三节 新时期文学的政治实践意义 383
- 第四节 启蒙主义：主体的政治与话语政治 396
- 第五节 新时期文学写作的政治焦虑 416
- 第六节 民间话语与话语政治 424
- 第七节 语言变革与语言政治 443



□何言宏

结 语 走向整合 470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的历史变革 470

第二节 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 474

主要参考书目 481

后 记 484



朱晓进

1956年12月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教委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4项；已出版《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鲁迅文学观综论》《“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找寻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角度》等个人学术专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先后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4项，曾获江苏社科联优秀论文一等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江苏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学科研优秀青年教师奖，获教育部高校教学名师奖。

导 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

导 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一直处于探索、创新和突破的态势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种种探索中，有人寄希望于价值评判标准的转换，有人期待以文学时段划分的改变来引发新的思路，有人则尝试着通过发掘久已湮没的作家作品来作精彩的突围表演，而有人则试图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来获取新的突破……这些，都曾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带来过新的机遇。而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更注重的是文学史研究的角度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真正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是否为该研究对象找寻到最合适的研究角度。

第一节 政治文化角度之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看任何事物都可以有多种角度，从任何角度都可能看到从其他角度所看不到的东西，每一种角度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事实上，在观照任何事物时，都有一个最佳角度的问题，即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才能了解最接近事物本质的特征。同样，文学史研究的角度也可以而且应该是多元的，但是观照不同时段的文学使用何种角度却不能是随意的，这里也有一个最佳角度的问题。多角度地去看事物固然是全面了解该事物的较好方案，但在任何具体的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事实上都不可能同时从所有的角度来进行，这就要有选择。角度的选择对文学史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紧紧抓住了特定时段影响文学的最最紧要的因素，对于揭示特定时段文学的生成原因、生存状况和主要特征无疑是有益的。文学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有对文学历史的“取景”问题，取什么景，即想昭示文学历史的哪一方面，想告诉人们什么东西，这自然是研究者的自由，但如果研究者希望自己所陈述的东西尽可能地符合文学历史的真相，希望自己所昭示的基本上是陈述对象

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特征，那么，他就不可能不考虑“取景”的角度问题。使用何种角度，关键要看这种角度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正是从这种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角度，我们可以从更为本质的方面来揭示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一些从其他角度所难以看出的问题，可以给予不同研究对象自身的独特性以更多的关注，当然也才可能得出一些从其他角度难以得出的结论，并从而有可能将该对象的研究引向深入。因此，能为每一个时段的文学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也许就是为文学史的研究找到了创新和突破的真正机遇。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就某种意义上讲，由于 20 世纪特殊的时代特点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使这个时代的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利于纯文学发展的态势。20 世纪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国共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使 20 世纪成为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我们说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五四时期曾提出的反载道的文学口号尚未能落到实处，而在“为人生”旗号下，政治化趋向已初露端倪，并很快便被早期的革命文学口号所代替。大革命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此后的文学发展，虽随政治形势变化而呈现不同态势，但却始终未能避开政治化“浪潮”的裹挟。20 世纪文学的发展，确实时时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氛围，这不仅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所表露出的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且全面体现在整体的文学目的和文学观念上。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 20 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从 20 世纪的特殊性出发，由这个阶段文学在总体上的明显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我们认为，选择从政治文化这一角度来观照文学，可以看出一些从其他角度所难以看出的问题，揭示出其他角度所难以揭示的更为接近该时段文学本质的特征，得出一些从其他角度难以得出的结论。就 20 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

非文学的世纪：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导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

第二节 作为研究方法的政治文化视角

研究中国 20 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来研究中国 20 世纪文学。我们的研究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历时已经很久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也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人们虽然明确意识到了政治维度，并试图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方式之前，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观地去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政治与文艺之间关系的历史深度仿佛在一块二维屏幕上被压扁了，一切都满足于在朦胧状态中被描述、被概括。这样所导致的后果是，要么在主观的想像中强化政治的作用，要么在盲目的臆测中否认政治对于文学事实上所起的作用，二极对立观点的构成其实都源于一种朦胧。事实上，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只能是历史地、具体地、阶段性地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文学史的研究正应该去历史地、具体地加以探究，以便揭开这种关系之上的朦胧面纱。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道关系方式的桥梁。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于 1956 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

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1958年，比尔（Samuel H. Beer）和鄂曼（Adam Ulam）在《政府的模式：欧洲主要政治体系》一书中所讲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政治价值、信仰体系、感情态度与符号。196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尤劳（Heinz Eulau）在其《政治学行为派》一书中肯定了“政治文化”概念的价值，认为它可以促进政治行为的研究，以比较不同文化体系或同一文化体系内“各次级文化”间的异同。1965年，白鲁恂（Lucian W. Pye）与弗巴（S. Verba）合编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书，白鲁恂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套态度、信仰与感情，此种态度、信仰与情感使政治过程有秩序及意义，同时为政治体系设下了基本前提与规则，以求控制体系中的行为。”而弗巴则认为：“政治文化是由包括经验性的信仰、表达的符号以及价值判断三者所交织的体系。它划定政治行为发生的背景，是政治活动的主观取向，包括一个政治体系的最高远的理想以及一般的行为规范。”^①1966年，阿尔蒙德与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合作发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一书，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涵义和定义作了进一步阐发和界定，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之中。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②上述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在此，我们并无意于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作更为具体的研究甚至解释，因为“政治文化”目

① 《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英文版），第513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②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第29页，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前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相对宽泛的学术领域。按照我们的理解，“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我们在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是基于我们对此的上述理解来使用的，而且，在我们研究政治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更主要地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而作为研究背景，广义的政治文化内容也有所涉及）。

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首先是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重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们通常对“政治”的解释，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另一解释，有时就是直接“指国事”。^①我们从上述对“政治”的解释中所能领略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这样，当我们谈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时，势必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马克思曾这样批评过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说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我们认为，在以往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研究中所最常见的诸如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等弊病也与此有关。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

① 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这对我们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提供了绝佳的中介。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活动，但最终“政治”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乃至最终影响文学作品等，却只能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个通道来完成的。“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治文化”是我们所试图找寻的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

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以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与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去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 20 世纪中国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还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本身所包孕的丰富的内蕴，这不仅是指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必将丰富我们对诸多政治与文学现象的解释语汇，而且是指与之相关的诸多的分析方式和方法，也将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诸多的启示。

第三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结缘方式

由于 20 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受政治文化学理论的启发，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受制于政治的不同特点。政治文化学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的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由于“少数社会成员攫取过多的物质利益”，“普遍民众付出的代价过高，因此下层对上层充满了报复心理，并且一遇机会就会付诸行动”。“国家虽极力用暴力手段压服民众的反抗，或以‘恩威并重’的手段分化民众、涣散他们的斗志，但效果并不显著，社会成员的精神共识、国家观念、整体思想仍是异常淡漠。”民众的“政

治取向多倾注于对次级国家组织及团体的认同上”。^①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就是如此。尤其是30年代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后，为了建立起支撑自身政权的政治文化，施行了一整套文化控制方略和文艺政策。权力主体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作用于权力客体时，如果轻重缓急较为得当，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沟通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良好的中介力量，成为二者共处一体的“粘合剂”，而“政治文化如果严重失真、扭曲、偏离，将迅速被权力客体摒弃”。^② 由于国民党所实行的种种文化控制方略和文艺政策是一种严重扭曲与偏离的政治文化，它并未能缓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紧张，反而造成了二者之间的严重疏离，因而造成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满情绪，引发了来自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政治文化反弹。由于文艺、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作为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艺、文学领域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无疑是针对国民党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权力客体所持的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意识。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具体体现为：第一，30年代文学群体多少在承担着“次级国家组织的团体”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即所有重要文学群体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权力主体政治文化取对立或游离的态度；文学群体中成员常常扮演着政治参与的角色，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文学群体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封闭性、宗派性或党派性；每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求，或者说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第二，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

① 参见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第三，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第四，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等等。

半整合模式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又“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但这种模式虽“一般具有民主政体的外壳，并明文规定各种民主程序，但政治机器运行过程往往被少数政治权威所把持，结果多是挂民主政治之名，行专制政治之实”。“不仅法律本身不健全，而且执法不严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法制易于被人治所取代是理所当然之事。”“在这里，官方意识形态及文化在有些场合下允许非官方意识形态及文化存在，但又总是伴随着前者对后者的严格限制，这种限制时常将后者逼迫到异常尴尬的境地。”^① 中国的“文革”时期以及更早一些时期的许多年代就是属于这种状况。在这些年代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被抬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文学的政治化趋向也因官方的刻意引导而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在这种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具体体现为：第一，与非整合模式中缺少绝对权威的主流政治文化有所不同，由于在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少数政治权威对政治运行过程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因而在这样的年代中，文学群体的官方化特征非常明显，任何文学组织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政府可以直接用行政手段控制、支配、左右这些文学组织。第二，文学只能以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文学不仅绝对不能传播任何非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绝对不允许不体现官方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谓的不允许“脱离政治”。这样，作家没有任何文学选择的空間，要么放弃创作，要么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充当这种工具。第三，文学观念的空前一致，即一切文学主张、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官方文艺政策而作的种种阐释，或者就是官方文艺政策的直接的

^① 参见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传声筒。与之相关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主要是基于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任何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从政治上找寻其可肯定之处，或从政治上找寻其该否定之处，而毫不顾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愿望。第四，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有相当强的灌输力量，由此形成了官方色彩相当浓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风尚，这又直接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并导致了诸多特殊文体的流行。

可以说，中国在 20 世纪的绝大半的年代，是处于上述非整合模式和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虽然这两种社会模式中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但在文学自身未能获得自足发展的足够空间这方面却是共同的。文学如何才能不仅仅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附庸，如何才能获得自身自足的发展呢？这当然需要有合适的外部环境，这种合适的外部环境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整合模式的社会形态。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国家基本上靠示范机制和馈赠物质与精神利益的手段解决政治认同问题。”“官方意识形态无需被奉为主臬，而是靠巨大的正向能量释放赢得社会尊崇，进而演变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国家意识形态不剪除地方和局部意识形态，也不否认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它们以文明竞争的方式争取社会成员。”“各种政治问题均以平等协商的文明程序加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法制成为人人共守的社会规范，是法律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法律。”^①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下，由于人们普遍具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人们有追随或不追随某种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文学必不会成为表达一种声音的工具。由于各种政治问题是以文明竞争、平等协商的方式而加以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治的紧张，消除了人们普遍的政治对峙心理，文学的政治化趋向亦会获得很大程度的缓解。由于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方式不再是受制于政治权力，而是受制于法律，人们便有了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更多地选择生活方式（文学选择也包括在其中）的权利和机会，文学自足发展的空间便不会再狭窄了。应该说，80 年代后期以及 90 年代以来的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文化氛围，正处于由半整合模式向整合模式过渡的“前整合模式”阶段。我们从 90 年代以来的文

^① 参见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